



道出真我

Speaking for Myself

(英) 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 著

何峻 余书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自传作品 细数与布莱尔30年相濡以沫的岁月

道出真我

Speaking for Myself

(英) 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 著

何峻 余书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出真我：切丽·布莱尔自传/(英)(Cherie Blair,
C.)著；何峻，余书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Speaking for Myself

ISBN 978 - 7 - 208 - 08691 - 3

I. 道… II. ①C…②何…③余… III. 布莱尔-自传
IV. K835.61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599 号

世纪文学出品

策划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张 莉 高婷婷

封面装帧 范乐春

SPEAKING FOR MYSELF: THE AUTOBIOGRAPHY BY CHERIE BLAIR

Copyright: © 2008 BY CHERIE BLAI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道出真我

切丽·布莱尔自传

[英]切丽·布莱尔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0 字数 319,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 978 - 7 - 208 - 08691 - 3/K · 1571

定价 35.00 元

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中，我周游的许多国家和城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 1966 年，当时我正在读大学，那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然而，当我在 1966 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我立刻就被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吸引。我在中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在中国的经历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英国的利物浦长大，英中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之间深厚的历史和商业渊源以及我个人的经历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一切都反映在我的传记中。

利物浦和上海一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两座城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邻水之城、活力四射、魅力十足、热爱足球……所以，两个城市始终交往密切并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由于两个城市在历史与贸易领域的诸多交流，中国元素在我生长的城市才会无所不在。

早在 1834 年，两个港口之间就已开始通航。到 1870 年，这条航线更加繁忙，数百位中国水手在利物浦定居下来。今天，利物浦拥有欧洲最古老的中国人社区，社区的唐人街就在市中心，华人的影响早已渗透到利物浦生活的方方面面。

伦敦也有唐人街，就在离我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不远的地方。伦敦经济学院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当然，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在现代世界取得应有的地位。但即便是那时，我的同学中也有一群中国学生。人们很容易认出他们，因为他们全都身着毛氏风格的服装，和我现在访问中国时看到的时髦年轻人大相径庭。

随着我律师生涯的发展，我开始接手英国的各类案件，同时也与香港的律师联手处理国际案件。正是早年我和托尼都还是律师时与香港的律师朋友们建立起的友谊，促成了我们在香港度过婚后的第一个假期。我们受到的款待和当地的美味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不过，要说是什么令我们对中国及其灿烂文化的一时兴趣变得更加持久而认真，

那还要归功于亲戚关系呢。托尼的哥哥比尔开始跟凯蒂·谢约会。凯蒂生在香港，但后来到伦敦学习并工作、定居。我觉得，凯蒂的父母一开始并不太想让女儿嫁给一个英国人，但看到俩人那么幸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

我和凯蒂深厚的友谊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我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也可以说，我亲身体会到了中国文化里强调的家庭重要性。凑巧的是，比尔和凯蒂的婚礼就是在托尼第一次参选国会议员期间举行的。尽管婚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但比尔和凯蒂执意从伦敦赶来支持托尼，一直忙到他们结婚那天。

托尼的那次竞选活动并不顺利，但凯蒂和比尔始终与我们并肩作战。托尼不负众望，在次年及以后的议员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凯蒂成为华人工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工作是确保华人社区的利益在工党及其政府的政治主张中得到反映。

我的孩子们打小时候起，就从凯蒂那里听到了中国人过年的传统和趣事。英国各地欢度春节的人越来越多，春节把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带到了一起。凯蒂每年都会在我们伦敦住处的附近用舞狮、奏乐、跳舞的方式组织中式贺岁活动。布莱尔家的三个小孩儿最起劲，尤其是给他们发装着压岁钱的红包时！从第一个假期开始，我和托尼的每次中国之行都是值得纪念的，包括去参加“香港回归交接仪式”，那是托尼当选首相后首次海外出访的目的地之一。在随后的10年里，我陪托尼三次正式访问了中国，使我有机会亲眼见证北京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奥运会更让整个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我喜欢运动，热爱奥运，所以能和家人一起来北京观看比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让我永生难忘。作为这场盛会的主办国，中国应该深感自豪。现在我正翘首期盼着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们也曾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北京的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如今，我们在中国结交了很多朋友，而且盼望将来能够常去中国。这些事情已远非当年利物浦的那个小女孩能够想象的，但这也正好说明了生命之中奇迹常在。

“希土事件”、苏联古巴卡文的“土共向来没有归顺”、《伊莎贝拉不忠者》

“五一财东，进一家样样来财到手，土俗山
首财兼数个乡里到成家，向外招亲，且姓王一齐土而炎黄子孙，去避世归山。

良身敬事，孝宗直出圣哲渊源。宣政金白志文山原民德文家风从典承印。清操
矣除了的志取宝珠西望林东武深根碧海，留香长驻。“洪”“诚”“妙”宜人存厚和美博五
口称“好，大伙儿，就这样。我们出去解决问题。”
“我生第一次天下无双，人情无二，怪生吾

卸任时刻终于来临，道别的话说完，眼角的泪擦干。托尼点头示意，门房打开那扇著名的前门，他弯腰时有点滑稽。我们6人一起踏进6月的阳光去面对镜头：尤安、尼基、凯瑟琳、利奥、托尼和我穿戴整齐——奶奶要在世，准说那是节日盛装——我们一起跨出那幢历史性建筑，最后一次“解决问题”。我微笑着，比10年前第一次在唐宁街面对媒体时成熟和睿智多了，那是一个明媚的5月上午，那时的我们还没进新家瞧一瞧，而未来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我不想托尼卸任，但我承认这时候该走了，怀着一个新决心，我逐个亲吻孩子，然后看着他们走向10号门，保姆杰姬会带他们去首相乡间别墅度过最后一个家庭周末，这是卸任首相的最后一道传统。托尼和我得先北上选区，他决定不拖泥带水，所以得尽快辞职，以便国会在夏季休会前举行首相补选。

托尼·布莱尔阁下、塞奇菲尔德议员、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现在只差向女王提交辞呈。车已候命，按照礼仪，有人护送托尼从最靠近人行道的车门坐上所谓的主座，即司机的正后面，我则要自己坐到托尼旁边，早已守候多时的摄影师们更有机会靠近我，大呼我的名字，一阵阵狂拍之后，是一串串讽刺：“留恋唐宁街吧？……我们会想你的！”

阳光在他们的镜头上闪烁，这些镜头总这样咄咄逼人，多像可怕的武器。我刚和朋友们道别，我们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们，我肯定会想他们，但绝不会想你们这帮人，绝不。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脱口而出：“再见，我才不会想你们！”然后大笑一声。

“你就不能容忍吗？ 嗯？” 车门在我身后关上，托尼咬牙切齿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应该表现得宽容一些，亲切一些。”

车向白厅驶去，我听到头顶上有一架直升机在轰隆作响，突然感到这个场景似曾相识。1997年我从列治文新月家出发去白金汉宫，穿着特意买的红套装，感觉良好，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喊：“嗨，妈！”抬头看见凯瑟琳和她表妹露西站在顶楼下朝我挥手道别，还看见蓝天下一架直升机的轮廓，心想它在上面做什么呢，完全没想到它正在拍摄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有邻居都出来为我们送行，从尤斯顿路到白金汉宫，人行道上全是人，有人挥手，有人欢呼，但那架直升机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它击打着我们头顶的空气，投下浓浓的阴影，一路紧随。

10年后，在这辆戴姆勒的后座里，看到身边的托尼板着脸，我不禁叹息。对于我的暴躁脾气，他也不再感到惊奇。这不是我第一次失控，也不像是最后一次，他早就说我是“牛脾气的利物浦人”。利物浦人也许真的暴躁易怒、强硬好战，但他们也有优点。他们敢于冒险、忠心耿耿、自尊自爱，信奉自力更生。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总是受排斥，所以需要幽默来解脱。有句利物浦古话说得好：“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引以为傲。”

媒体和它无情的同伙总是不留口德，说我贪得无餍、诡计多端、出尽洋相。我知道我不是圣人，我也会犯错，他们只是拿我当靶子攻击我丈夫而已。我出世就不顺，两个坚强的女人养大了我，我学会了辩驳。讽刺的是，在我矢志不渝的律师和法官生涯中，你总能听见我慷慨激昂地为别人辩护，但在个人生活中，我的心声却几乎无人倾听。当车在林阴道上缓缓而行，我突然精神一振，感到所有的顾忌都可以抛开了。我已经跋涉了很久，也学到了很多，时间已到，我决定为自己辩护一回。

∞ 目录 ∞

序言	001
2007年6月	001
第1章 父母邂逅	001
第2章 漸漸長大	012
第3章 少女時代	017
第4章 中學時代	026
第5章 大學時代	034
第6章 初遇托尼	046
第7章 诉讼律师	056
第8章 浪漫爱情	065
第9章 甜蜜婚礼	074
第10章 初涉政治	082
第11章 国会议员	093
第12章 初次搬家	106
第13章 继续前行	114
第14章 一切皆变	121
第15章 近在咫尺	131
第16章 跨越障碍	137

第 17 章 家庭生活	146
第 18 章 大选热潮	157
第 19 章 当选首相	163
第 20 章 崭新黎明	173
第 21 章 特殊关系	184
第 22 章 国际旅程	192
第 23 章 改弦更张	204
第 24 章 全新视野	214
第 25 章 未来之瑕	229
第 26 章 伊战风云	238
第 27 章 冲突迭起	248
第 28 章 我的过失	258
第 29 章 家庭攸关	271
第 30 章 坚持到底	284
第 31 章 祈祷祝福	298
第 32 章 离情依依	310

1954 年 1 月的一天，年轻的乔伊斯·史密斯在一家电影院里看《金粉世家》，突然发现电影院里竟然有她从未见过的一个人影。原来，电影院旁边的小巷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刚刚搬来不久，丈夫是托尼·布斯，妻子是乔伊斯·史密斯。托尼·布斯是位普通的矿工，妻子乔伊斯·史密斯是位演员，两人都是第一次来诺丁汉。托尼·布斯在一家电影院工作，妻子乔伊斯·史密斯在一家剧院工作，两人都是刚刚从乡下搬到城市来的。托尼·布斯和乔伊斯·史密斯在电影院旁边的小巷里相遇了，托尼·布斯对乔伊斯·史密斯一见钟情，而乔伊斯·史密斯也被托尼·布斯的真诚所吸引。两人开始约会，很快便坠入爱河。1954 年 5 月，托尼·布斯和乔伊斯·史密斯在电影院旁边的小巷里举行了婚礼，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那一年是 1954 年，那个女婴就是我。长大后，我总是听奶奶不厌其烦地讲父母如何相遇、如何度过各自的童年，还有我为什么叫切丽。

爸爸托尼·布斯去当演员纯属意外。他在服兵役时曾长期追求一位上校的妻子。她对业余演出非常着迷，他想，去当演员兴许就能追上她。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舞台了。虽然他经常抱怨剧院满是男同性恋者，但当演员还是有很多艳遇机会。

妈妈乔伊斯·史密斯的演艺生涯比爸爸正规得多，她是科班出身，比爸爸小一岁，在诺丁汉西边的一个小矿村伊肯斯顿长大。

外婆汉纳·迷尔有几分神秘，她的娘家姓与众不同。她是当地的大美女，一头秀发乌黑亮泽，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外公杰克·史密斯是个非凡的男人，完全是自学成才。他 14 岁就下矿工作，很快由普通工升为放炮工，冲在队伍最前面，只背一盏矿灯自保，他的任务就是放炮。最后他当上了煤矿经理。

有时我们会去伊肯斯顿看望外公，我记得他脸上的蓝色大伤疤把我吓得不轻。他后来解释说，如果在矿里受了伤，即使小心翼翼，伤口也会沾着煤尘，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蓝色。还有一件趣事，他洗澡时喜欢用很多很多水。那时他已经不在矿里工作了，没必

要那么浪费水，真是积习难改。他还住在我妈妈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浴室还在楼下，以前外婆会在那为他搓背，厕纸还是零零碎碎的报纸，挂在一个钩子上。

外公本来想当医生，但作为 11 个孩子中的老大，这是不可能的。最像医生的一次是加入圣约翰救伤队营救受伤的矿工。后来他给别人讲急救课，还拿我妈妈做试验，她很不乐意。外公精力充沛，活跃于工党和救世军。他还会写诗，晚年获得了开放大学颁发的一个学位。他一直工作到 80 岁，退休后还去当守夜人。

如果这还不够，那我告诉你，外公还是个足球裁判，办过青年社和投球社，妈妈总是被迫参加，心里讨厌得很，但她很喜欢外公在一战期间开的那个青年社。外公还很有音乐才华，没有他不会的乐器，他曾经训练过一些少男少女，带他们去老人家里或医院里义务演出，每次都是妈妈用钢琴、长笛或小提琴伴奏。

妈妈受过一段非凡的教育，曾在迈克尔书院读书，它是首批鲁道夫·史代纳学校之一，如今在希普利乡村公园边上仍十分吃香，教育理念非常前卫。妈妈是 1936 年入学的，那时她才三岁半。音乐和运动，也叫韵律运动，是迈克尔书院的核心教育理念，它甚至有自己的剧场，一开始妈妈就经常在那演出。

但是悲剧来袭。一战结束不久，我未曾谋面的外婆去世了，年仅 42 岁。她娘家人就在当地，但不怎么往来，所以她死后，姐妹们并未伸出援手。14 岁的妈妈既要上学，又要做家务、照顾她 10 岁的弟弟，还要服侍外公。外公早上很早就去矿上，出门前会点上壁炉，仅此而已，剩下的家务都落在妈妈身上：买菜做饭、洗洗涮涮、熨烫衣服、打扫屋子，外公晚上从矿上归来，妈妈还要帮他搓背。她聪明能干，外公打算一直让她上学，等到 18 岁考上大学，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尽管妈妈努力做到学习和家务两不误，但一年后迈克尔书院还是将她劝退了。

其间，妈妈认识了贝里尔·约翰，贝里尔曾是演员，因为被疾病中断了演艺事业，就开了一所业余戏剧学校，私下授课。妈妈想去学，也不知外公是怎么交得起那笔学费的。妈妈学得不错，但有一天外公突然宣布要再婚，妈妈从没见过继母，只知道她叫梅布尔。并非无理取闹，但妈妈还是把所有的不快都撒在继母身上，婚礼那天，她收拾行李离家出走了。继母前脚进门，她就后脚出门，一去不回。在贝里尔阿姨（后来我这样叫她）的鼓励下，妈妈成功申读当时就赫赫有名的皇家戏剧学院，然后向德比郡议会申

请助学金,却惨遭拒绝,本科生助学金 50 年代就有,但戏剧学生深受歧视。最后还是外公出手相助。妈妈认为他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因为愧疚。

在皇家戏剧学院学习一年后,暑假到了,妈妈需要赚钱,更需要梦寐以求的舞台经验,于是她欣然接受了一份暑期轮演工作。她工作的阿姆斯壮伯爵轮演剧团是一对夫妇执掌的“临时”剧团,总部设在约克郡。

排练一周后,剧团起程去威尔士演出,妈妈有了一个艺名,叫盖尔·霍华德,和贝里尔阿姨的原艺名盖伊·霍华德差不多。妈妈很快和一名年轻男演员做搭档,上演一幕幕浪漫的爱情故事。他来自利物浦,没学过表演,但魅力超凡。事实证明,他们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妈妈回忆道,有一次,他们连续有 30 场演出,但一切都要自己动手:缝戏服、卖戏票、搭戏台、换场景。表演本身只是锦上添花的最后一笔。新剧总在加演,要是缺演员,他们总能不花钱就在当地找到很多热衷于演戏的业余演员。

几周过后,两个年轻演员的舞台之吻渐渐变成了现实之恋。9 月来得实在太快,皇家戏剧学院要开学了。在戏剧学院学表演固然不错,但专业演员都会告诉你,学表演比不上真实的爱情,所以妈妈没回学院。她留在了威尔士,辗转更多城镇进行演出,其中一个镇历史上没有记载,我猜可能是拉亚德,离威尔士中部的兰德林多德威尔斯不远,这样想就明白了。戏台隔壁有家咖啡店,演员们经常光顾那里,店主是一个母亲,带着一个 8 岁小女孩,她是个小戏迷,每天晚上她都从一楼卧室的窗子爬出来,溜到后台入口,央求守门的人让她进去看戏。那时托尼 21 岁,盖尔 20 岁,自己差不多还算是孩子,但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都会送小女孩回家,把她从窗口递回去。他们觉得她冰雪聪明,所以非常喜欢她。那年圣诞节,他们又回到拉亚德演了 3 个哑剧和 1 个圣诞剧。圣诞剧的名字随时间的流逝已遗忘了,妈妈只记得演员表里有两只狗叫笨笨和混混。3 个哑剧分别是《灰姑娘》、《公主和猪倌》、《林中的两个小孩》,妈妈分别扮演灰姑娘、公主和其中一个小孩,另一个小孩的扮演者就是咖啡店里那个聪明的小女孩,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虽然一句台词也没有。

那个季节的演出后,妈妈怀孕了,但剧团拒绝给他们涨工资,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回伦敦。那个小女孩伤心欲绝,她再也见不到这两个新朋友了。妈妈对小女孩许下诺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如果我肚子里也是个女孩,就取和你一样的名字。”他们兑现了

承诺。那个小女孩叫切丽。

在我出生前 6 个月,托尼·布斯和盖尔·霍华德在马里波恩登记处登记结婚了,从时间上说还算像样。婚礼草草收场,因为卡索福德轮演剧团有一个工作机会,他们第二天就要去排练。他们的证婚人是房东的弟弟(妈妈在皇家戏剧学院读书时认识的)和登记员助理,是一个姓“圣诞节”的男人。登记后,房东的弟弟带着这对新人来到皮卡迪利广场一家名为“里昂玉米园”的咖啡店顶楼,有 4 个人在奏乐,他们开始庆祝婚礼,喝茶、吃蛋糕,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他们要坐 4 个小时火车才能到约克郡。

第二年秋天他们还在北部,爸爸已在弗兰克·伏德秋名艺人公司工作。根据出生证明,我于 1954 年 9 月 23 日在伯里的费厄菲尔德医院出生,当晚演出结束后,爸爸在台上宣布自己刚刚喜得千金,台下的观众一片愕然。他向老板请假两周去看望女儿,但老板拒绝了他,他就拿出托尼·布斯风范,和老板动起手来,最后丢了工作。工作没了,房租却要照付,年轻的夫妇只好把女婴塞进四周铺好尿布、满是化妆油气味的篮子里,然后踏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

克罗斯比在利物浦北端,居民信奉天主教,每年即使没有上万,也有数千爱尔兰家庭从这里登船,告别家乡。他们确信只要几周,最多不过数月,就能横过大西洋,驶向美国的新生活。有些人梦想成真,更多人梦断天涯。曼哈顿繁华的天际线如此遥远,梦想破灭的人只好留在利物浦谋生,有的当建筑工,有的当码头工。

因此,克罗斯比是一片令人充满渴望的土地。爷爷乔治·布斯和奶奶维拉住在克罗斯比的贫民区——滑铁卢区。他们的排房有几分出众,楼上有两个半卧室(半个是前门上方的储藏室,能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楼下有一个前室(客厅),一个里屋(起居室),一个厨房和一个碗碟储藏室。虽然简陋了点,但水电齐全,绝不丢脸,毕竟这是自己的房子。门前蕨谷街的尽头是一座公园,里面有几个秋千和一个旋转木马。这座公园是滑铁卢贫民区(排房)和大克罗斯比区(半独立房)的分界线。棘谷街、橡谷街等“谷”街形成了一个格子,蕨谷街是最后一格,都毗邻圣约翰街,也就是最热闹的购物街,肉店、当铺、杂货店、理发店和旧货店,应有尽有,当时的我以为它就是世界中心。

和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样,蕨谷街 15 号的奶奶家有一个凸窗,前面有个小花园,后面有个稍大的花园,被二战初期的家庭防空洞占去一些地方。其他房子都是清一色

的黄砖房,但我们家的房子却被涂成了奶绿色,据说是太姥爷在世时涂的,他绝不放过一切表达自己政治倾向的机会。

在英国,利物浦的天主教徒最多,所以道德标准很高。它以无工业为荣,工业就留给曼彻斯特这些小地方吧。《1956 年净化空气法》出台前,北方工业城市总是浓烟笼罩,只有等风吹走了浓烟,人们才敢把衣服晒出来,这种工业不足为傲。利物浦始终是个码头,所以默西塞德郡需要的是临时劳动力,失业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必须相互帮助,今天你帮助邻居,明天上帝帮助你。在工党 1945 年赢得大选以及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福利国家制度建立之前,利物浦就在社区自发互助中生存了下来,帮助他人,义不容辞,这一美德从未消亡,就像举手之劳,即使这样会让你捉襟见肘。

蕨谷街 15 号是个典型的天主教家庭。奶奶出生时叫维拉·汤普森,虽然生在利物浦,利物浦口音很重,但却是爱尔兰守旧派家长。她有两个弟弟:埃德加和威廉。我刚到奶奶家时,威廉舅爷就荣拥三家小杂货店,他是靠推着自行车卖茶水起家的,茶水箱就绑在后座。奶奶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太姥姥,叫玛蒂尔达,昵称蒂莉,跟着家人从爱尔兰梅奥郡(或科克郡,看你信仰哪个)向美国进发,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一家没能走出利物浦码头。后来,她认识了太姥爷,然后结婚生子。

太姥爷叫罗伯特·汤普森,他的身世总是家人争论的话题。奶奶说他来自约克郡,本来姓“汤克德”,家就在哈利法克斯附近,但一战时他弃家逃亡爱尔兰,为了避免检查,才改姓“汤普森”。另一种说法是,他本来就是爱尔兰人,没去成美国,才留在了利物浦。

毫无争议的是,太姥爷性格火爆,在相马、饮酒和输钱方面很有天赋。他还是个激进分子,1926 年总罢工时,他参加了码头工人罢工会,被默西船坞和港务局列入黑名单。从此他只能去理发店里打工赚钱,那个桔色的理发店就在码头大门外,他是理发员,专为水手剪头发刮胡子,他们出海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口袋里都是钱,急着往外掏。但也有人不舍得花钱,太姥爷说他最后不得不收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代替现金,有时是一只陪着水手好多年的鹦鹉,有时是一只猴子,但太姥姥从不让它进前门。最后太姥爷在小斯堪的纳维亚一带的丹麦街角开起了自己的理发店。那一带都是铺着鹅卵石的狭窄街道,两边是背靠背的房屋,洗手间就在屋外,这一带是我上小学的必经之路。

可惜啊,我从没见过太姥爷,他 1946 年就去世了,爸爸很喜欢他,说他出殡时,滑铁

卢区的街道上都站满了哀悼者，从蕨谷街一直到圣埃德蒙教堂。

丈夫去世后，太姥姥就搬到奶奶家，独居在楼上那个储藏室。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那年我7岁。她是家中唯一独住一间的人，我从未见她动手干过家务，但偶尔会挥动鸡毛掸子扫扫灰尘，表示她愿意帮忙。她每天主要的活动就是透过蕾丝窗帘观看楼下的人来人往。她身材娇小，像一只鸟儿，满头银发里夹杂着几丝红发。传说中的古怪脾气依然如初，不过她对我倒很容忍，偶尔我穿着护士制服，用一个塑料注射器在她胳膊上“注射”时，她竟然也不生气，还经常给我零花钱。

在一个爱幻想的小女孩看来，爷爷祖先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刺激。他们就是普通的英国百姓，没有什么悬而未决的神秘故事，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爷爷的妈妈家，也就是我太奶奶家，在利物浦郊外的佛姆比经营一个小渔船队，爷爷的爸爸家，也就我太爷爷家，是威斯特摩兰郡的普通山民。但爷爷死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家族故事并非平铺直叙、波澜不惊，一战中我太爷爷布斯曾经是个反战派，并因此入狱，出狱后去莫斯山当担架工，在那里严重酗酒；太奶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走私犯，还兼任黑社会老大，向商号收取保护费。

和有爱尔兰血统的奶奶相比，爷爷乔治·布斯不是个健谈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我到蕨谷街后，他更少在家了，每出海6周才回家休息10天。他是奥瑞尔商船上的主要日志员，商船曾从利物浦航行到尼日利亚，在他写的拉各斯见闻中，非洲是那么栩栩如生。爷爷一有机会就弹钢琴，只有弹琴时他才能回归自我。爸爸说爷爷儿时曾经拒绝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又有机会与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杰拉尔多共事。这也许是真实的，虽然爷爷从没对我提过。他的钢琴水平绝对超过那些酒吧钢琴家。他的钢琴脚下堆满了从纽约带回来的活页乐谱，他后来所在的丘纳德航运公司的商船曾到过纽约。受他熏陶，我至今还能哼唱出很多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是好是坏，另当别论。

爷爷是个温和敏感的男人，他的字体小巧漂亮，非常工整。但他并非奶奶首选的结婚对象。奶奶告诉我，她失恋后情绪波动，才嫁给了爷爷。她原本的“挚爱”是一个新教徒，拒绝为她改信天主教，他们只好分手，这时爱弹钢琴的爷爷才有了机会。爷爷是她弟弟的朋友，暗恋她多年。但他的求婚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等奶奶到了29岁，韶华不

多了，才意识到一个好男人的爱值得大家啧啧称赞。爷爷显然很爱奶奶，总想当着我们的面亲她一口，可她总用手挡开，娇嗔一句“老不正经”。多年以后，奶奶才发现爷爷竟然也不是天主教徒。虽然表面上是，但他早改教了，早知如此，奶奶肯定不嫁给他了，但对爷爷来说，宗教无足轻重。他几乎不去教堂，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所以看起来并不奇怪，而且我们家多的是牧师，足够为全家人升入天堂作祈祷。奶奶的表弟伯纳德·哈维就是当地的教区牧师，他是太姥姥蒂莉的一个侄子；还有奶奶的两个亲弟弟一家：威廉舅爷在家庭中的道德地位很高，因为他的5个儿子中有3个是牧师，其中约翰牧师和我爸爸一般大，保罗牧师只比我大几岁，我依然记得保罗牧师从神学院回来时，身上仿佛神光万丈，奶奶不准我们女孩子接近他，生怕我们的存在玷污了他的神性！

天主教对我十分重要，但我和它的因缘并非一帆风顺。洗礼时就一波三折。我在伯里出生后，父母在当地找了一个和奶奶差不多的天主教徒为我登记了姓名，但没有为我洗礼，这无异于一个不可赦免的罪孽。幸好，奶奶有表弟伯纳德牧师，能马上为我洗礼，清除罪孽，所以我到达蕨谷街几个小时后，奶奶就抱着我去找他。

“维拉，这个女婴叫什么名字？”

“切丽。”

“叫什么？”

“切丽。”

“是吗？”

“是的。”

“维拉，无须我告诉你，圣堂里没有哪个女圣人是叫切丽……”

确实如此。那年是1954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的前10年。仪式仍然是用拉丁文。修女们仍然戴着及地的面罩，奶奶很清楚，一个婴儿要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就得有一个天主教圣人的圣名。虽然圣名多达七千个，奇奇怪怪的圣名也很多，但就算仔细察看，也找不出一个“切丽圣人”。

最后终于达成妥协，我的洗礼名定为堤里莎·卡拉：堤里莎是一个真诚的女圣人，卡拉是切丽的拉丁文，或许正契合伯纳德牧师力图遵循教法的初衷。与此同时，奶奶在劳埃德银行滑铁卢分行为我开了个账户，户名自然是堤里莎·卡拉·布斯，这个名字我

一直用到 1997 年。

我妈妈对此当然毫无发言权。虽然她家也非常信教，外公参加过救世军，她自己小时候也上过主日学校，她说很高兴看到我成为天主教徒，无论如何毫无怨念。其实她这样默许是另有原因的。和天底下最强势的奶奶犟嘴，谁也不乐意，她更犯不着，何况她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没人想找奶奶的麻烦。

从经济萧条中走过来的人们不会完全忘记那种记忆。吃苦将就，对奶奶来说毫不新鲜，那是多年来经济形势严峻的结果。二战前的 10 年，爷爷实际上一直失业。英美贸易完全停滞，海面上不见商船，码头上空空如也，工作只青睐那些有门路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只好出来养家糊口。奶奶什么都做，曾替布兰德沙的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克罗斯比离那儿并不远，但金钱和前景却比它差好几个光年。奶奶就奔波在这富有和贫穷的两极之间，我们当然属于贫穷那一极。

结婚之前，奶奶曾在布兰德沙一家叫佩思布拉的布店工作，她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儿子进来买布。十分喜欢孩子的奶奶忍不住去逗弄他的小下巴，问他叫什么名字。

“托尼。”年轻的妈妈回答。后来奶奶才知道事实上她把“安东尼”发成了“托尼”。

“哦，”奶奶说，“我很喜欢那个名字。以后我生了儿子，也叫他托尼。”年轻的妈妈顿时满脸不屑：你这样穷人的儿子哪配和我儿子一样叫托尼。那表情让奶奶永生难忘。阶级意识就这样一辈子烙在了奶奶身上，她一直认为法律有两种，一种是富人法，另一种是穷人法。爸爸快 10 岁时，得了那个年代常见的猩红热，被送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奶奶只能隔着窗子探望他。爸爸出院后，埋怨奶奶从不去床边看他。“因为医生不准我去。”奶奶说。爸爸告诉她，他旁边病床也是个男孩，他父母每天都去床边看望他，他家在布兰德沙。我不知道爸爸在医院里住了多久，即使没有数月，也有数周，奶奶的疏忽无疑伤了他的心。我想奶奶对他也很愧疚，她竟然那样逆来顺受，从不争取去床边探望儿子。爷爷永远无法原谅爸爸抛弃妈妈（当然是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但奶奶一直不忍心和他断绝联系。

我渐渐长大，从奶奶那里听说了爸爸的童年，所以他后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也能理解几分。他 1932 年出生，自然和布兰德沙那个富家儿子同名。1935 年，奥德丽